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〇三）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六六期 ——  
(二〇〇四年一月二十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1c)

---

【痛定思痛】历史悲剧不容重演——《王申酉文集》读后	苏绍智
【人物春秋】肖劲光与复出后的苏振华	佚名
【人物追踪】与戚本禹面对面	余汝信
【不堪回首】动荡岁月	霄云
【研究报告】沉痛的“使命”——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任国庆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痛定思痛】

历史悲剧不容重演——《王申酉文集》读后

• 苏绍智 •

(关于王申酉一案的资料，请见本刊 zk0210a 和 zk0210b——编者)

杰出的青年思想家王申酉因思想获罪，竟在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后被捕，1977年4月27日“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遭枪杀。这是一件突出的冤案。事隔四年，于1981年4月3日才得平反昭雪。中共一向讳言自己的错误，不许宣传王申酉。今天知道王申酉的人不多了。

感谢金凤、丁东大力编注了《王申酉文集》，并为该书的出版奋斗了22年之久，才于2002年8月在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承丁东先生赠我一本，读后悲愤填膺，久久不能平静。

《文集》的内容十分奇特，构成文集主体的部分竟是王申酉被捕后被勒令写的六万言的“供词”。这份“供词”原来是王申酉写给他的女朋友谈他自己的世界观和政治观点的信，还没有发

出，竟作为“恶毒攻击罪”的罪证。其内容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剖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得出批判个人崇拜，纠正反右派、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错误，要求尊重价值规律，发展商品经济，打破闭关锁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改革思想。多与后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看法和主张暗合。读过他的“供词”的人无不钦佩他的独立思想、卓越见解，公认他是一位杰出的青年思想家，而对他的冤案义愤叹息，呼吁历史悲剧不容重演。

王申酉之处决在“四人帮”倒台半年之后，人们多认为，他是牺牲于“两个凡是”的屠刀下。这固然是事实，但是如果进行深层的分析，这种看法显然是不够的。王申酉冤案实导因于中国两千多年来始终未能清除的专制主义，以思想和言论治罪和人治而非法治的传统。

王申酉出身贫穷的工人家庭，照文革时的说法是“根正苗红”，他用功读书，立志钻研自然科学，照理不应遭此厄运。他是勤于思考的人，好将自己的思想写在日记上。他的厄运始于他的日记引起班级政治指导员的注意，竟卑鄙地让学生干部偷看、偷抄他的日记，并向组织汇报。政治指导员要求他交出日记。王申酉坚持他的独立人格、拒不交出。从此，他被视为落后，甚至反动。文革中他的日记被抄，他被正式戴上“反动学生”的帽子。1967年大学毕业，十年不予分配，留校监督劳动。他仍努力学习，监管人员毫不放松。毛泽东逝世当天，王申酉正在给女朋友写信，监管人员突然出现，迫令他交出信。王申酉拒不交出，并予撕毁，于是他被逮捕。“供词”就是他在看守所被勒令重新交待他的信的内容。

私人的信件、日记受到保护，乃是人权应有之义。在专制主义统治下，不顾人权，以卑鄙的特务手段和镇压工具探听人民的思想、言论以便钳制，并最后以思想言论治罪。这是王申酉冤案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

其次，王申酉既未参加“反动组织”，又没有公开散布任何言论，只不过在给女朋友的信中表述他的政治观点，信未写完，又未发出，居然荒唐、野蛮地以“莫须有”的“恶毒攻击罪”定罪。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会竟在短短的六分钟内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书面行文尚未到达之前，判决后三分钟内立即处决，完全是践踏法律，草菅人命。

当时上海市法院院长宋季文原拟定为死缓，后来怕被视为“右倾”，又匆忙改为“立即执行”。个人的一句话就能决定一个人的生死，法律、良心完全没有了，专凭政治气候、政治需要判刑，正是人治的特点。

专制主义统治下，只有人治、没有法治，党政领导人个人决定最终审判，没有司法独立，不依法律程序，这是王申酉冤案产生的又一根原因。

今天，人民群众的觉悟日益提高，国际上对人权问题的关注日益加深，像王申酉冤案那样的草菅人民的冤案不容发生。但是，专制主义统治中国的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上述产生王申酉冤案的两个根本原因仍然存在，是以中国人权的状况仍趋恶化。最近以思想、言论治罪的案件层出不穷，单单因在网络上发表言论而被拘捕和判刑的人士达四十余人，引起海内外正义人士的抗议。

以思想、言论治罪，中共建国以来毁灭了多少志士仁人、青年才俊。要防止历史悲剧重演，必须实行民主宪政，实行法治和司法独立，给予人民以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宗教自由，彻底废除思想、言论治罪，彻底消灭“文字狱”。

王申酉冤案发生在“两个凡是”统治之时。照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王申酉之平反应该指日可待。但是冤案之平反却拖了四年，到1981年4月3日才实现。

王申酉 1977 年 4 月 27 日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上海市革委会常委会只讨论了短短的六分钟。为了讨论王申酉冤案之平反问题，上海市委常委竟开了 19 次会。金凤估计，19 次会每次如以三小时计便有 57 小时，合 3420 分钟，是 6 分钟的 570 倍。真是“古之所无，今之罕有”的怪事。

上海市委常委开这么多的会，因为对王申酉冤案平反问题分歧很大，争论激烈。一种意见是，王申酉是理论上有成就的青年，为探索真理而献身，应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宣传。一种意见是王申酉是追求真理的好青年，政治上应该平反，但也不必大事张扬。又一种意见是，王申酉在政治上、思想上还是有“严重错误”，判死刑是重了，却依然是个“思想犯”。

第一种意见当然正确，且有利于提倡解放思想，独立人格，鼓励为真理而奋斗。而这正是中共当局所害怕的。其不被采纳可以理解。

第三种意见实际上是中共的传统办法。一个人被处分，不会没有错，即使平反了，也要留条尾巴，以显示中共领导永远正确。但是在八十年代初，十一届三中全会不久，胡耀邦正在抓平反冤假错案，如果照此办理，不但不得人心，甚至引起民愤。

看来第二种意见占上风，平反但不得张扬。一张扬，不是有损于党的“伟大、光荣、正确”了吗？从《王申酉文集》一书的出版所遭到的曲折，障碍可见一斑。

金凤 1980 年秋到上海，参加上海几家报纸、电台和新华社分社的“联合调查组”，采访有关王申酉一案。她以激动的心情尽力完成初稿，打了小样，送给当时主管宣传的邓力群。邓力群的回答十足令人愤慨。他居然说，“大作拜读了，写得有感情，不要公开发表了吧。藏之名山，传之后世吧。哈哈！”文章就这样被邓力群封锁了。奇怪的是邓力群早已不掌权了，但是他的“藏之名山”，却注定了这本书的命运。

四年之后，1984 年，金凤又把稿子改了一遍，北京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不幸该出版社刚创刊的杂志上，登了一篇犯禁的文章，杂志夭折，出版社负责人作检查，再也不敢冒风险，出版成为泡影。

又隔三年，1987 年湖南人民出版社愿意出版，副总编朱正亲自编辑妥当。不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开始，出版部门亦被波及，湖南人民出版社遭查封，朱正亦被撤职，文集的出版又流产。1999 年深圳一家出版社表示愿意出版，但又无疾而终。

这本书始终未能在大陆出版，直到 2002 年夏天才在香港高文出版社出版，距离金凤写出初稿已经 22 年，距离王申酉被处决已经 25 年。恐怕是出版史少有的吧！

从王申酉冤案之平反和《王申酉文集》之出版可以看到中国宪法中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之遭扼杀到什么程度。中共当局对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真理的追求害怕到什么程度。过去以“恶毒攻击罪”这一“莫须有”的罪名残害多少思想先行者，今天继续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另一“莫须有”的罪名拘捕，判刑多位伸张正义、追求真理的网络作家，充分反映了中共当局的心虚和没有自信心，难道几篇文章就能颠覆国家政权？那政权也未免太脆弱了。

《王申酉文集》之不能在国内出版，中国没有言论出版自由是根本原因，正如李慎之在谈到他的文章不能在中国出版时所说，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主义仍在统治也。”

胡锦涛、温家宝执政以来，屡言尊重宪法权威，以人为本，“新三民主义”、“三贴近”，最近胡锦涛又肯定了民主的普世价值，将推进渐进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最近温家宝又把“发展民主，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和人权”作为当前要做好的第一件事。人民要“听其言，观其行”，要求看到的是实效。希望胡温之言能够兑现。目前，不妨以取消因思想言论治罪，消除“良心犯”和“文字狱”作为“渐进民主”的第一步，以取信于民。

□ 摘自“自由亚洲电台”（2004年1月3日）

~~~~~

## 【人物春秋】

### 肖劲光与复出后的苏振华

• 佚 名 •

（苏振华是王申酉被判处死刑时上海市的三位主要党政领导人之一（另外两位是彭冲和倪志福），对王申酉之死是有责任的。本文作者不详，似乎代表官方对苏的结论，仅涉及苏在海军的所作所为，对他在上海的作为和王案一字不提。供参考。——编者）

#### 一、肖劲光力争苏振华复出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由海军司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主持海军工作，这一年，在肖劲光的领导下，海军的军事训练工作有了相当大的起色。1972年1月，肖劲光收到身陷逆境的苏振华的家属为其申诉的信件，肖劲光对苏振华的不幸遭遇感同身受，他立即设法把申诉信转给毛泽东同志。2月，在毛泽东、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苏振华得以从湖南偏僻的关押地回到北京。毛泽东批准他恢复工作，改任海军第一副司令，在海军司令、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肖劲光的领导下分管作训工作。

#### 二、批林整风中产生矛盾

1972年7月，为贯彻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海军党委召开四届五次全委扩大会简称“四·五”会议，按照会议议程，准备先传达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议精神，然后结合海军实际批林整风。7月17日，“四·五”会议正式开会。会议的前一阶段，联系李作鹏、张秀川自1962年以来在海军的所作所为进行批林，会议开得很正常。不料9月21日，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海军的会议纠缠着历史问题，批林整风中在历史问题的旧帐上纠缠，容易走偏方向，中央政治局约肖、苏、王、吴同志开个会解决一下。”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肖劲光与苏振华、王宏坤、吴瑞林同志列席了政治局会议。张春桥在会上态度十分严厉。他说：“从去年中央77号文件以来，明确了批林是重点、‘九大’以来是重点，而你们把重点放在过去的问题上。”江青直截了当地说：“斗争的锋芒是对着文化大革命还是对着林彪，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这次会议给“四·五”会议作了“走偏了方向”的结论，会议的第二阶段就开始纠偏，“以批林为重点”，“九大”以来为重点。10月，叶剑英同志主持召开了军委办公会议，海军常委列席了会议，叶剑英同志肯定了海军这段会议的做法，对会议的总结报告提了一些修改意见。与会讨论修改了这个总结报告。周恩来同志说了“会议不要开得太长，要适时结束”的话。然而，就在会议马上就要结束的时候，形势突然急转直下。11月29日下午，军委召集海军常委和刚刚赶来的六大军区负责人的会议，传达了前一天中央政治局会议的指示要点，大意是中央不能批准海军会议的总结报告，海军会议第一阶段纠缠历史问题，走偏了方向；第二阶段重点批王、吴，颠倒了主次。对海军四个月的会议做了全盘否定。“四·五”会议一直是在军委及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召开的，每项议程都直接报告过叶剑英同志，中央领导同志也对

这段会议作了上述肯定。此时的反常，不仅打击了肖劲光，而且殃及叶剑英同志和中央领导同志。

这以后，会议成立了以苏振华同志为首的领导小组，组织了40多人参加的会中之会，专门帮助肖劲光认识莫须有的上“贼船”问题，小型会议以及整个“四·五”会议都由张春桥抓总，苏振华同志具体负责，实际上排斥了叶剑英同志对会议的领导。这段时间，肖劲光在苏振华同志主持的海军大大小小30几次会议上的检查都没通过，搞得他心力交瘁，每晚只睡三小时，心脏病反复发作，从精神上到身体上都近乎于垮了。1973年1月，在形势的逼迫下，肖劲光的检讨几易其稿，最后，不得不承认自己上了“贼船”。2月20日晚，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军委领导、海军常委列席会议。张春桥在会上大谈他如何修改“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这个报告就是后来以中共中央（1973）10号文件的名义批转的海军“四·五”会议的“情况报告”，给肖劲光做了上“贼船”的结论。

“四·五”会议后，由批肖有功的苏振华接替了肖劲光的海军党委第一书记职务，并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主持海军工作，做为司令的肖劲光则在常委中分工管调研。肖劲光与苏振华两位老同志的矛盾由此产生。这当中做为政治局里分管海军工作的张春桥无疑地起了很大的作用。1978年粉碎“四人帮”后，肖劲光的问题迟迟不得解决，1978年8月，邓小平在肖劲光给中央的上书上批示“同意叶帅意见，请国清同志办理。”但就是这样，在长达几个月的平反过程中，还遇到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阻扰，平反过程一无进展。1979年5月5日，在苏振华逝世整整3个月后，中共中央批发了（1979）19号文件决定给予肖劲光彻底平反。

### 三、“批林批孔”起风波

1973年，在批林整风运动中与张春桥密切配合的苏振华一路顺风的参加了中共“十大”，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4年新年伊始，一场由“四人帮”策动的“批林批孔”运动，在海军发难了。1月23日，海军直属机关召开“批林批孔”大会，迟群、谢静宜两人带着江青给苏振华的亲笔信和两百本《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并在会上作了盛气凌人的讲话。大会后，苏振华签发了以海军党委名义给江青的致敬信，接着，先后两次印发江青给他的亲笔信，散发的范围很广，在海军造成批林批孔”的强大声势。海军实际上成了江青全国性“批林批孔”运动的试点单位。三月份，海军召开“批林批孔”汇报会时，苏振华公开指责肖劲光在1972年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代表海军的发言说成有些地方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并以王洪文“揭不开盖子要炸开”的指示为依据，不顾肖劲光和大多数常委的反对，坚持在东海舰队航空兵机关搞以大字报为武器的“批林批孔”试点，结果海军上下大字报铺天盖地，层层揭盖子，把矛头指向肖劲光等一批所谓“搞复辟倒退”的领导干部，搞乱了部队的思想，干扰了部队建设。使海军党委处于非常被动的地位。1974年的6月26日，江青在苏振华陪同下乘坐大连海军基地的军舰，看到水兵戴的水兵帽上的飘带时说：“这是纪念纳尔逊的，是帝国主义造成的”，苏振华就赶紧下令剪掉全海军士兵帽上的飘带并坚持说“不管怎么样，反正是外国的东西”，“江青同志讨厌这个东西”。对于江青这个人的寡廉鲜耻，当时大多数党的高级干部都有觉察，而苏振华对江青做的这些姿态，不能不说是投其所好，步步紧跟。直到1974年7月17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批评了“四人帮”，这才使苏振华对“四人帮”的严重性有了认识和警惕，开始保持一定的距离。

### 四、短暂而难得的一致

1975年1月，邓小平出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之后，又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随着邓小平的复出，邓小平当年的老部下苏振华开始参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四

届人大后，由于“四人帮”的诬告，毛泽东同志曾指责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做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和参与处理军委日常工作的军队领导当然也在批评之列，这无疑使苏振华在对“四人帮”有了认识和警惕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反感。6月苏振华、肖劲光参加了邓小平主持召开的军委扩大会。对邓小平提出的整顿部队，革除肿、散、奢、惰，解决领导班子软、懒、散等一系列主张，苏振华、肖劲光都一致赞成，并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对“四人帮”搞的批判经验主义、文艺专制主义、煽动资产阶级派性、反对落实政策等，进行了严肃的批判。海军党委还下发文件，提出要重新修改、制定装备、生产、科研、工程等十年规划。同时，抓部队技术、战术基础训练，抓干部整训，抓院校建设，抓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健全……部队精简整编、体制改革等工作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这是苏振华复出后与肖劲光唯一的一次在工作上短暂的一致。海军经过整顿，各项工作都有了新的起色。对此，“四人帮”在海军的帮派骨干分子，收集苏振华、肖劲光的讲话向“四人帮”告状，说他们“否定文化大革命”，是“还乡团”。一时闹的海军乌烟瘴气。

## 五、批邓中再起风波

1975年11月底，肖劲光、苏振华参加了三座门召开的军委会，会上传达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这个讲话要点实际上把小平同志1975年以来的工作说成是翻案，布置了回去后向常委传达文件精神，分步骤地向各级领导同志打招呼，参加“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肖劲光听了这个传达后，心里凉透了。几个月来，在小平同志倡导的整顿军队的大好形势下，海军的工作有了很大的起色。考虑到，自1975年以来，苏振华同志带领海军党委一班人积极在海军贯彻执行小平“整顿”的方针，海军党委内部思想比较一致，工作有成绩，如果盲目贯彻要点精神，意味着下步工作必须转向，这是一个很大的弯子。因此，肖劲光对苏振华说：“说小平同志翻案，事实根据是什么，我们不清楚。”建议海军不要抢先贯彻《要点》，看看情况再说，苏振华不仅没有采纳这个要冒风险的正确意见，反而来了个大转弯。苏振华在12月，针对海军准备召开扩大传达《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的会议，提出了几条极左的意见……此后，苏振华领导海军积极开展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亲自带领海军党委常委去清华大学参观“批邓”的大字报，在参观中做指名道姓的“批邓”讲话，调子很高。1976年4月7日晚，中央传达了“两个决议”，海军又很快组织召开了海直机关拥护“两个决议”的大会，苏振华在书面发言中说“天安门广场事件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政治事件”，“充分说明邓小平是党内外资产阶级的总代表”，“已经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等等。以后多次讲话超过了中央的提法，“批邓”的调子越来越高，以至发展到用极其恶毒的语言对邓小平同志进行人身攻击，影响极坏。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有毛泽东的指示，又有“四人帮”的强大政治压力，绝大多数不具备很高马列主义水平和胆略的党的干部，受传统的纪律约束，针锋相对地与“批邓”唱反调是很难做到的。但是，历史发展到1976年，绝大多数干部，包括广大人民群众，都在用各种方式拥护小平同志，抵制“四人帮”，即使不得不说违心的话，表态也都十分有限，有的干脆沉默不语。而作为一个1975年曾十分积极拥护邓小平同志“整顿”方针的党的高级领导人——苏振华同志的这些表现，使人想法很多，也很难让人理解。

1976年，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过世。肖劲光在悲痛的同时忧心忡忡，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两次驱车前往叶帅家，向叶帅倾诉了对江青、张春桥一伙可能有异动的看法，也反映了“四·五”会议以后，与苏振华同志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分歧意见，特别是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的一些分歧。在这次谈话中肖劲光还对叶帅说，如果在对待“四人帮”这个问题上苏振华同志态度明朗，他们之间的一切分歧都算不了什么，可以不提了。事后，肖劲光遵照叶帅的指示来到苏振华同志的家里交换意见，并就“四人帮”的问题向苏振华吹吹风。没想到苏振华同志对此不置可否，让肖劲光坐了冷板凳，这进一步加大了他们之间的分歧。

## 六、围绕“两个凡是”的斗争

从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78年的“三中全会”的两年时间里，和全国一样，海军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过程中，也遇到了严重障碍，走了一条曲折的路。当时主持海军工作的苏振华同志，从指导思想接受并积极推行华国锋同志“两个凡是”的方针，开始是坚持批邓，以后又反对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压制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并极力搞对华国锋同志的个人崇拜。华国锋同志也投桃报李，在1977年初对苏振华同志做了“在与四人帮斗争是积极坚决的”批示，这个批示不符合事实，掩盖了苏振华同志的“左”的错误，对海军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同时，对苏振华同志认识改正自己的错误是有害的。同年8月，苏振华参加了中共“十一大”，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苏振华同志借助这个批示和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地位继续推行“左”的一套，犯了严重错误，阻碍了海军拨乱反正工作的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1976年11月，海军在粉碎“四人帮”后开展了“揭批查”运动，这很自然地牵涉到海军“四·五”会议以来苏振华同志追随“四人帮”所犯的一些错误，以肖劲光为代表的同志还公开指名批评了他。但苏振华同志以“两个凡是”为根据，凭借华国锋同志对他的“评价”，非但不检查纠正这些错误，反而打击报复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在海军抓所谓“四人帮”的“帮派体系”。特别是1978年3月开始的“查整改”运动，原是为了总结160舰爆炸事故的经验教训。而苏振华同志却出于个人需要，推行“左”的做法，搞扩大化，借此机会打击一批与他有不同意见，揭发他错误的同志，动辄点名批判、宣布停职、撤职、隔离审查，甚至逮捕。错整了一大批干部，造成严重的后果。

邓小平同志出来重新工作以后，为了纠正华国锋同志推行的“两个凡是”为代表的“左”的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78年他针对海军出现重大事故的问题对海军工作作了一些批评。苏振华同志对批评不服，心怀不满，转到华国锋同志那里告状，华对苏表示支持，同时他们避开海军司令肖劲光，不经军委集体讨论单独商定检阅海军事项。决定后也不向军委和总参报告，不经过具体业务部门就擅自于1978年4月着手调集海军大量舰艇北上旅顺演习。实际上这是对批评做出的一种姿态，动机是不好的，政治上是错误的，组织上是不正常的。肖劲光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指示海军参谋长杨国宇去军委、总参报告，肖劲光也马上直接打电话给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向他报告了这件事。罗瑞卿不同意这次演习，便打电话给华国锋同志，想申诉自己的意见，然而华国锋同志竟拒绝接电话。罗瑞卿只有转而在邓小平的支持下经军委集体研究，认为海军集中这样多的兵力在旅顺搞演习、检阅不妥，及时终止了这次错误行动。

1978年5月，全国开展“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海军迟迟不表态，当肖劲光同志在海军常委会上提出这个问题时，苏振华同志却说：“你们也不看看形势，中央没有表态，弄不好要犯错误。”压制了海军“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以至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直至1979年1月的军委扩大会上，肖劲光同志就苏振华同志的错误提出批评，王震同志也提出分量很重的批评时，苏振华同志仍不接受意见，甚至振振有词地说自己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批评他要通过中央。当时主持会议的徐向前同志十分严肃地说：“你要考虑你问题的性质”。苏振华同志这才无话可辩，静下来接受与会同志的批评帮助。1979年2月7日，苏振华同志突发心肌梗塞猝然逝世。

1981年，中央鉴于苏振华同志的错误对海军影响很深很广，搞乱了部队的思想，伤害了许多干部败坏了党的传统作风，严重影响了海军的安定团结，军委办公会议为解决苏振华同志的问题专门发了（1981）16号《纪要》。接着肖劲光同志主持召开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海军党委扩大会议纪要》，会上常委们一致认为，苏振华同志的问题既然发展成为严重

影响海军建设的问题，那么，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分清是非，从而达到统一思想，增强团结的目的。

## 七、苏振华同志的功过

苏振华同志是个老同志了，战争年代就是刘邓大军的一员大将，几十年为党做了很多工作，对党、对人民、对海军建设都是有贡献的，不因为谈其错误而抹杀了他长期革命斗争中的功绩，“文革”初期苏振华同志抵制“四人帮”左倾错误也是有功的。我们在今天实事求是地分析这些错误，一方面是为了正确认识海军的这段历史，分清是非，统一思想，增强团结；一方面也是为了吸取经验教训，而不是为了追究个人的责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苏振华同志犯的错误，既有长期以来“左”的思想影响的客观历史原因，又有主观思想原因，即私心太重。对此，肖劲光同志评价说：“是不是政治品质问题，我想应当用发展的眼光看，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问题是存在的。”我们认为，苏振华同志一生的功过对我党、我军、我国人民都是有经验教训可借鉴的。“前车之鉴，后事之师”这应当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的最终目的。

~~~~~

### 【人物追踪】

#### 与戚本禹面对面

· 余汝信 ·

戚本禹，胶东威海人氏，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族人后裔，为人倜傥大度。文革初，未及不惑，际会风云，人称“戚大帅”。及后，因“王关戚”案锒铛入狱，自此作别政坛。

近日，得友人介绍，与戚结识。甫一见面，余即谓之，少年时代，曾夜读其《袁崇焕》一书。时隔四十载，对其与罗尔纲等关于李秀成自述的论争文章，仍历历在目，恍如昨天。戚面露喜色，瞬即拉近彼此距离，此后谈话过程，基本上是有问必答，未有顾忌。

#### 一、从十六级干部到中办代理主任

余笑问道：文革中，老兵讥讽你仅为十七级干部，然否？

戚答：非也。十六级，比彼等所言高一级（大笑）。

余又问道：外间有传你是山东大学历史系毕业？

戚答：否。本人仅为中学学历。历史，全凭自学。

戚随后爽快地谈及了早年的经历。称，1942年随父到上海（父为沪上报关行低级职员，属当今所谓“蓝领”）。未几，就读于据称是国人在上海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进步思想，投身地下学运，十七岁加入中共。上海解放后，被选送至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1950年5月4日——戚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分配到中南海，时年仅十九岁。

戚报到处，为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师哲，副主任江青、田家英（戚着重说明，江的名字排在田前）。师哲离开后，未有任命正职，由田负责，重要问题与江青商量。

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八大”以后，取消中央书记，称中办政治秘



书室，其实，就是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在提及毛泽东及周恩来时，戚一般都循习惯用“主席”和“总理”的尊称。这里及后文引述戚的话时称毛、周，是余行文时所改）。其它中央书记，各自另有秘书班子。初时最重要的工作，是编《毛选》1—3卷，戚是田家英的助手，负责校对，一篇文章，逐字逐句读着校，要读五六十遍。

余问：劳动大学结业后，为何你能千里挑一，到毛处工作？

戚答：可能是成绩拔尖，理论水平高吧。

事后，余想起江青也是山东人，籍贯在这里是否起了些作用？可惜当日没有来得及问戚。

戚说，五十年代后期，秘书室有五个科，其为一科科长，级别定为十六级，此后再未曾调整过。

余问：一科是干什么的？

戚答：主要负责处理毛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

余问：那你是否“一组”成员？

戚似乎觉得这个问题问得外行，称：不是。戚回答的语气给余的感觉更似乎是不大看得起“一组”的人。余后得知，“一组”属中办警卫局管，负责毛的随身警卫、饮食起居，与“政治”不沾边，与政治秘书室更是两码事。

戚继续说，评李秀成自述一文得毛褒扬后，1964年夏，陈伯达点名要其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工作，毛首肯，但有言在先——如有事须随传随到，故此，戚的中南海甲区出入证一直没有收缴。在《红旗》任历史组组长，也就一年多的时间，1966年春夏之交，组成文革文件起草小组，为成员，5月，起草小组正式定名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仍为成员，同时调回中央办公厅。夏天，被任命为中办秘书局副局长，局长是童小鹏。

中办秘书局是将政治秘书室、机要室这两个毛自己的秘书、机要班子，和习称“后楼”的中办研究室三合一而组成的新机构，与中办警卫局、机要局同级。第二年夏天毛泽东南巡，汪东兴随卫，毛指定戚代理中办主任，为时很短，仅两三个月。

余说，读过戚写于近年的《毛泽东秘书田家英被暗杀？自杀？——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香港《明报月刊》2002年12月号），文章不长但说理充份，逻辑性很强。其中有一段话引起余的注意：“田家英的真正错误和他自杀的原因，也应给予实事求是的分析”。读后曾请教过知情者，大概猜到戚所指何事，这日，向戚求证，戚点头称是。

余又问：评李秀成自述，是否上头旨意？与当年重提《逸经》的瞿秋白狱中自白有无关联？

戚答：诚然，文章发表后，得毛击掌赞赏，并在一张刊有此文的报纸空白处批曰：“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张报纸后来不知所终），但该文写作完全是个人行为，绝非奉命文章，与对瞿秋白的再评价，亦无丝毫关系。

## 二、毛、江不可分

戚至今仍认为，其1968年1月被毛、江所抛弃（“抛弃”是余的说法，戚没有用这个词），是由于对来自上海的一批有关江本人的材料处置失当所致。而在余看来，即使没有1968，也会有1976，戚的厄运，终究难逃。

从1950年到1968年，是戚人生高峰的十八年。而自1968年被关进秦城单独囚禁直到1986年出狱，戚的人生低谷，恰恰又是十八年。前十八年，戚将毛看作恩师，后十

八年，毛就是他的灾星。戚以前曾对人说过，前后相抵，扯平。而今天的戚，心底似乎已平静如水，谈及往事，没有流露出一丝对毛的怨恨（至少，余没有这样的感觉）。

余问：记得文革三十年之际，《亚洲周刊》曾采访过你，那一期杂志，我至今还保留着。那一次，对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有关毛私生活的描述，你认为是随心所欲的编造，今天，你仍这样看吗？

戚答：对，我仍这样看。我在中南海十八年，虽非“一组”成员，也算是接近毛的人，怎么就一次也没有碰见过李志绥所说的那种情形？毛不是一般的领导人，他是天字第一号，随卫人员众多，一举一动，都逃不过警卫的眼睛（毛亦因此发过脾气，认为失却人生自由）。毛的房间有一特点，就是没有可以锁得上的门，房间门上只挂有布帘子，“一组”的人不用敲“门”也无从敲“门”就可进入，怎么会有与别的女孩子“大被同眠”的情形发生？

余问：你对江青总体印象如何？

戚答：她就是小心眼，好报复，当党和国家领导人，远不够格，但没有现今人们普遍所说的那么坏。毛、江的关系一直很好，感情甚笃，直到晚年，尚为如此。说毛对江没有感情，那是骗人的话。

以上有关毛、江个人品格的观点，戚声言为其本人近距离观感，余未予置评。而至于毛、江与世界潮流背道而驰的治国理念及因此给国人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余虽感同身受，惟因时间关系，未及与戚展开讨论。话题转入了一些戚当年经历过的事件。

### 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两个细节

据余所知，戚是1966年5月北京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列席者，当日求证于戚，戚说，他参加了。

余问：“516通知”是如何举手通过的？

戚答：先是主持会议的刘少奇请出席会议的政治局成员表决，未有反对意见。其后，刘少奇再向坐在后排的列席人员说，你们也表表态，这样，列席者也纷纷举手，算是出席、列席会议的人都“一致通过”，但后者应不计入票数。

余问：有著述提及会议过程批陆定一时，林彪写有一叶群的“处女证明书”，会议参加者人手一份，阅后收回，然否？

戚答：没有见过这么一个“证明书”。批陆时，发过一份材料，是陆夫人严慰冰写的匿名信。此事是严慰冰很不对，在严信之前，党内高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不正常的事——党中央副主席的家庭受到了不断的来历不明的骚扰。

笔者认为，戚的回忆应与事实相符。以逻辑推理，既然是批陆的会议，不可能只发林的辩解而不发陆、严的“罪证”，不可能只有“果”而没有“因”，仅发林的“证明书”（即使假设是有的），能说明什么问题呢？而以上两个细节情况，笔者从另一位会议列席者处也得到了证实。

### 四、“518讲话”的整理者

论及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过程，戚说，这次会议，名义上是刘少奇主持，实际上，起核心作用的是周恩来，周比刘更能领会毛的意图。

林彪“518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它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

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宫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

余说：周也有讲话。

戚答：是。但周讲得比较零散，没有林系统。周讲话的主题是反修，讲话中对陆定一骂得最厉害。

戚又说，今天看来，林的讲话有点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地看，林彪功劳很大（对林的这个评价，戚重复了几遍），在东北，面对蒋集团最强大的军事力量，战而胜之。

## 五、目睹毛给江的信被烧毁

余问：有关毛1966年7月8日给江青的信，外间有所质疑。你是当时的中办秘书局负责人，是否知道有这么一封信？为什么今天我们看不到这封非同寻常的重要信件的原件？

戚答：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份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

余问：毛的信，传阅者可以抄吗？

戚答：可以。据我所知，周处还有大量的毛其它批件的抄件。

余说：你的回忆，与官方解释有出入。官方的说法是，毛的信在发出前给周恩来、王任重看过，毛叫秘书抄了一份。1972年5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的，是毛秘书的抄件。

戚答：当时，我负责毛的文件的保管，没有这样的印象。以后印发的，应该是根据周恩来的抄件。

余问：那么，在江青处的原件呢？

戚答：林彪知道毛有这么一封信（估计江青交党内最高层传阅时，林也是传阅人之一）。在林彪从大连回到北京后的一天，叶群到钓鱼台找江青谈这封信的事。叶群对江青说，林总不放心，为避免以后发生不好的影响，请示了主席，主席说，烧了吧。烧的时候，在江青的住处，江、叶在场，把我也叫去了（叫去的原因，戚推测是怕日后万一说不清楚，好有人作证），江青说了大致情况，我无意看信的内容，怕日后惹麻烦，待信完全烧光，叶才离开。

余问：有人怀疑，现在发表的抄件，与烧了的原信有出入。

戚说：我没有看过原信的内容，不好评论。但应该不会有大的出入，为什么要有出入呢？没有必要作改动。原信对林彪肯定是有些不利，否则，叶群不会那么紧张兮兮。

戚又说：今日我说的有关这封信的话，你可以公开。

余最后道：你说陶铸看过这封信，我相信。

笔者之所以相信陶铸看过这封信，是因数年前曾查阅过1966年8月初中共中央以中央文件形式转发的陶铸一封给中央及毛泽东的信（文件当年仅发至省军级并规定不得下传），信中有几段话，笔者作过摘录：

“七月二十八日上午，中央宣传部委托熊复、唐平铸两同志召集首都各报负责人，传达了主席七月二十五日关于今后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语言的指示，作了讨论。

大家肯定林彪同志提出的这些话是正确的，开始从解放军报宣传，以后逐渐成为全国普遍运用的语言，非常深入人心……”。

“主席指示：今后不用这类语言。大家认为这是伟大领袖的谦虚态度。我们应当按主席的指示办”。

“考虑到群众情绪和当前斗争的需要，不宜于突然全部停止使用这类语言，因此，大家建议采取如下的步骤：

一、在代表党政领导机关的发言和文件中，在报纸的社论、标题、按语和新闻导语中，都不用这类语言；在群众稿件中有这类语言的，还应当保留一个时期……”。

如果陶铸不知毛的底细，能有这封信、敢说这些话吗？

同月，林彪、陶铸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分别跃升为中共第二、第四号人物，毛的这种刻意安排，给人们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

戚本禹目前是一间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他的角色转换和言谈中流露出来的对当今社会的适应程度，令经历过文革的笔者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据戚说，公司的效益不错。

（2004年1月）

□ 原载《新世纪》网站。

~~~~~

## 【不堪回首】

动荡岁月

• 霄 云 •

我和我的同代人是唱着“听妈妈讲过那过去的故事”度过了我们的童年时光。“我的爸爸”或“我的妈妈”也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学生都写过的作文题目。可轮到我的女儿也到了该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的年龄，不提我的过去还好，一提我女儿就会说：“妈妈，你们那时候怎么那么傻啊？”于是我只能免开尊口，只能把那些傻年代的傻故事留作对那一段人类痴狂历史的反思。

## ◇ “启蒙”

初三时，我在北京一所女校读书。一天，校团委书记，一位大大咧咧的女复员军人突然约我去谈话。她先问我为什么不写入团申请书，又批评我忘记了继承革命先烈的遗志，缺乏为革命接班的志向，并且教导我现在为无产阶级学习，将来为无产阶级服务。一番训导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孩子第一次痛心疾首，悔恨自己没出息。临走时，她拍拍我的肩，居然微笑着递我一张入团志愿书——同龄人盼望以待的“优秀青年”的入场券。

从此，我上课不再画小人，编织小花篮，下课猛读《雷锋日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本来爱扎蝴蝶结、穿花裙子的我，穿上了打补丁的衣服；本来嘻嘻哈哈、无忧无虑的我不知怎么一下子变得有了思想和理想。在我的发动下，每个工、农、军、干子女的铅笔盒上都贴有一个“座右铭——为无产阶级发奋学习”，而且都暗下决心，要超过班上资本家、知识

分子出身的同学。这一下，本来和我很要好的出身不红的同学明显地感到了压力和无形的距离。“出身是不能选择的，而道路是可以选择的”这句抽象的宣传语变成了我“帮助”过的资本家出身的同学的具体行动。于是，她们不给父亲倒洗脚水，不要父亲的零花钱……当她们佩戴上团徽的时候，她们的家里却由父女情深变成了父女反目。

那是文革发生前的一、两年，也就是说文革前学校已经刮起了“阶级斗争”的风。当你积极地要求上进，一切以“革命的名义”打上“阶级烙印”时，你就失去了自然感受和反应的能力，你将不会有真实的眼光去观察和判断。

文革初期，我和哥哥在书店门口排队买毛泽东选集。转眼看见一个擦皮鞋的小贩正在给一位翘着二郎腿、读着报纸的眼镜先生擦皮鞋。那时正是“破四旧”阶段，什么看不顺眼都可以与旧思想、旧传统挂上勾。让人擦皮鞋不是剥削行为吗？我想上去管，又害怕。经过内心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红卫兵的责任感让我壮着胆子上前对眼镜先生说：“你不会自己动手擦皮鞋吗？为什么要占用别人的劳动？”眼镜先生楞了一下，放下他的二郎腿，正准备走路却一把被那擦鞋的老头按住。那老头儿指着我的鼻子用苏北话骂娘，唾沫喷了我一脸，还抄起凳子要砸我，说：“你敢砸我的饭碗，我就砸死你！”

不知是吓的还是气的，反正我哭得抽不上气来。好心解放被剥削阶级，反而受到被剥削阶级怒斥，我彻底傻了……哥哥把我一把拉过来，众人也把那老头拉开了。我们书也不买了，只好灰溜溜地回家。路上我一肚子委屈，对哥哥说：“你也算红卫兵，你为什么不管。”已是大学的哥哥用一种与我理论不清的眼光看着我：“你呀，太天真了！”

#### ◇ 红色风暴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那上万身穿绿军装、臂戴红袖章的红卫兵热泪盈眶，欢呼跳跃的场景激动了整整一代的年青人。十六、七岁的娃娃成了毛泽东向他的旧友新敌开战的排头兵。毛泽东用他那诗人般的豪迈“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他的一张大字报，一句批示，一次检阅，一封家信可以让一个国家的十亿人人为之疯狂，为之冲锋陷阵，可以让上至国家领导，下至街道居民引经据典，却无人可以预料什么是毛泽东的确定的终极目标。毛泽东的追随者们，曾艰苦卓绝从蒋介石手中夺下了江山，而一夜之间毛泽东让“大民主大自由”的群众运动去决定他们的生死存亡。毛泽东以他那伟人的风度“乱云飞渡仍从容”，却“搅得周天寒彻”。这种不惜翻江倒海的治国、治人的深谋大略和魄力堪称史无前例。

我当时在上海读高一。不上课，不考试，写大字报的日子让我们在这些历经寒窗苦的学生大感自由的释放。而北京红卫兵迈出校门、走上街头，扫除一切牛鬼蛇神的惊人创举受到毛泽东首肯，使每个人都嗅出了文化大革命已经超越了文教领域。一天几个同学约我同行去北京，说是当晚有首列免费的直达火车。一贯恪守严格家规的我居然悄悄地溜出家门，就背着一个书包上了火车，和满车厢的上北京朝圣的中学生站着挤着到了北京。在火车站我写了一封信给父母说，“想想您们当年离家参加革命的情景，不要责怪您们的女儿不辞而别”。在北京，我们睡在接待站或大学的长凳上，吃着免费供应的馒头或窝头，在红色风暴中度过了让人灵魂脱壳的一周。

当我回到一年前在北京读初中的那所曾负盛名的历史悠久的教会女中，有着歌德式建筑风格的礼堂已被木板封住，宽大的操场成了草场和垃圾场。那位找我谈过话的团委书记因为是军人出身，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当上了校革委会主任。而原来受人尊崇的、曾是北京市模范教师的教导主任，却和许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的教师同关在一个大大的教室，但被拦成的一个个小格子里。当我看到她胸前挂着大牌子，剃着阴阳头，用一副惊恐的眼神悄悄地

瞄了我一眼时，我给吓坏了，我一个劲地问自己：“我过去为什么没看出她是一个坏人？”而丝毫不去怀疑她为什么会被看成坏人。当我参观北京市男六中——红卫兵武斗的首创地，我亲眼目睹了红色风暴的惨烈。一个和我年龄差不多的男孩子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一边就随意地用宽宽的军皮带抽向一个蹲在地上的老师的头部。那皮带上的铜扣“叭”地让头顶冒出了血。周围那一声声的惨叫和金属击到骨质的抽打声此起彼伏，让人头晕目眩，毛骨悚然。我不知道这所学校的红卫兵用这种残暴的手段害了多少无辜的老师。那一场景让我一合眼就出现在眼前，吓得我不敢入睡。

在团中央的大院里，我亲眼看到胡耀邦被逼着从窗子里爬出来，戴着黑帮的高帽子，弯着腰，对着麦克风说：“我是牛鬼蛇神，我是反党分子。”每三十分钟出来表演一回，满足一批批“革命群众”的义愤和好奇心。

北京城内的每一个人都已经被贴上了标签或是惶惶不可终日地等待着被贴上标签。过去你是共产党员或劳动模范，可你也许并没有出身在工农家庭；你是工农出身，却有个远亲跑到了港台；你就是祖宗三代清白，但可能仍逃不脱“三名三高”腐化堕落，现行反革命……反正只要有人出来揭发你，有一个算一个。

在我童年度过最快乐时光的有上百人居住的清王府大院里也是草木皆兵。这家是叛徒，那家是黑帮，我连最好的朋友家也不能去。她的父亲已成了黑帮分子。我在一位站在了“无产阶级阵线”的过去常给父亲讲历史的叔叔家住了一晚。他让我不要接触任何人，因为阶级斗争复杂，阵线不分明，他告诉我回上海后要告诉父亲认清形势，早些站出自来自我革命，并要我转告父亲，随他到上海的一位老秘书被揭出过去常常到黑帮家开黑会，很可能是黑帮分子派到父亲身边的眼线。我从小喜欢读侦探小说，而眼前的一切比侦探小说里的情节还要让我惊愕，不知何时何地会有特务钻出来，哪怕是那个打我五岁开始就给爸爸当秘书的、让我尊敬的叔叔。第二天，我在北京的一个哥哥赶来见我，塞给了我十元钱（我身无分文），要我赶快离开北京，他说他会给爸爸妈妈打招呼，保证不会骂我。

于是，我只身一人又乘上了拥挤的免费火车。我用哥哥给我的钱买了一些毛主席的像章，作为朝圣归来的赐物分给同学，那是像一分钱币那么大的文革中第一批铸制的像章，据说留到现在能当文物卖。

在火车上有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子坐在了我旁边，一见面就向我介绍是军干子弟，父亲是什么军衔，这在北京已成了“八旗子弟”的接头暗号。出身好就是免费的保险单，坐在她身边我内心踏实不少。不一会儿，一批红卫兵把车厢里的老头、老太太全押出去了，据说他们是从北京城遣返回乡的地富分子，也不知他们在乡下是否还有家。他们被押到车厢之间的过道上，从那里不时传来训斥和抽打的声音。当我去洗手间时，看到坐在地上东倒西歪的“地富分子”与屎尿汗臭混为一堆，没个人样儿。一路上他们被一站站地押下火车，过道上的人越来越少了。待我找到空隙回到原座，我旁边那个女孩儿不见了，我的衣服、书包，连同我买的那些像章都不见了。听人说红卫兵发现了那女子的父亲是受押解的地富分子，而她到处招摇撞骗，还把我的毛主席像章送给红卫兵。不知怎么她就露了马脚，被红卫兵一起押下了车，我的东西都随她走了。这又一次使我看到了自己的“阶级觉悟”如此迟钝。但在若干年以后，那女孩儿的境遇成了我若干问号中的一个，不知她会不会幸运地活到今天，给她的孩子讲“妈妈过去的故事”。

没有被“红色风暴”吓住的我，却从跨入家门起便战战兢兢。迎接我的第一道禁令是：不许出门，等父亲回来训话。我擅自离家自有过错，但让父亲愤怒的是我的名字居然上了市里的内参，说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些上海领导干部的子女在北京参加武斗（当时上海唯恐北京的红色

风暴会蔓延到上海，市委请求周总理出面保上海这个国家经济重镇)。尽管我为自己辩解：我只是看到了打人，但从没有打过人，但我仍被关在家里几天，学习中央文革的十六条规定。后来回到学校时，红卫兵早已成立。第一批戴红袖章的中学生都出身于“红五类”，“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成了我们的红卫兵军歌，一个个耀武扬威。学校的礼堂成了大辩论的论坛，会场内外挤满了来自各校串联的学生。台上一句：“我们父辈创下的江山，能让资产阶级改变颜色吗？”台下齐鸣：“不能！不能！不能！”看看今日阿扁煽情的本事和搞族群对立的手法恐怕还是从红卫兵那里学来的呢。

不久，第一个联合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成立，也是后来被称为保皇派的红卫兵。总部设在人民广场内的市政府大楼内。总部的政体俨然象一个样样齐全的官僚机构：从司令部、政委到部、处长。由于权力分配的不公而带来的内部矛盾没几天就开始了。我被派到总部的红卫兵报编辑部当差。解放日报的印刷厂给我们排版、印刷。我最得意的是派给了一辆自行车，我可以不在爸爸妈妈的眼皮下受管束。几天下来，我把附近的街道全骑遍了，我的自行车技术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练成的。

一天听说我们红卫兵“警卫处”的伙计们抓到了一个在公开场合污辱妇女的流氓，正在一楼大厅里被“触及皮肉”，我赶去看热闹。只见一个最多20岁的很结实、英俊的大个子被十几个男生团团围住，他们有的轮流练“扫荡腿”，扫倒了，站起来，再扫。还有的用练刺杀的木枪直插他的胸部，直到他趴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男生打够了，冲我们女生喊：“上！胆小鬼干不了革命！”几个女生有的上去踢一脚，有的用皮带去抽，我捡起一根草绳也在他背上抽了一下，遭到一阵嘲笑。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打了人，尽管被评为“对敌人恨之不深”，但我却永远不会忘记那场莫名其妙的仇恨阶级敌人的试验。后来听说派出所接到报告后前来收尸，那年头警察也不敢得罪红卫兵。至于那小伙子是不是流氓却无从查起，就活活给打死了。

由于父亲的反对和我对总部的失望，我辞去了那份差事回家。不久，与我们对立的造反组织冲垮了我们的总部，听说司令，一位高三的男生，抱着总部的牌子睡了十来天，也算是“牌子还在，阵地在。”可树倒猢猻散，一个月前还在争权夺利的大小“官员们”都弃阵地去外地串联去了。与保皇派对立的造反派成了毛泽东新战役的排头兵，他们的眼界比我们第一批红卫兵大多了，他们已不在乎内部的争权夺利，而是直接夺党政军大权。“革革过命的人的命”——林彪这句绕口令是他们的斗争方向，而我们这些保革过命的人的保皇红卫兵纷纷中箭下马，成了比黑五类还要黑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孝子贤孙，被批判，被送进走资派子女学习班，有的还坐了牢。红色风暴在社会上狂刮了一阵之后，一个旋风转过来，把我们自己刮进了一个黑色的深渊。“革命”与“反革命”，“台上”与“台下”，“整人的”和“被整的”……这种向对立面转化的矛盾双方在十年中都尝试了人生的轮回，做过人也做过鬼，倒也算公平。

#### ◇ 爸爸挨斗的日子

文化革命初期，上海市委是受到周总理保护的。因为上海的经济占国民生产总值的六分之一，因为文化革命的策源地是上海，因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上海的渊源，各派势力都不想贸然对上海开刀。尽管北京红卫兵三司发起了对市委的冲击、对市领导人的斗争会，但依然动摇不了上海市委的领导地位。我的父亲那时在市委里负责与红卫兵联络，所有的斗争会他都代表市委上台挨斗。因为他的工人出身，往往第一个问题：“什么出身？”“工人！”就无法让红卫兵同仇敌忾。爸爸每每回来都有几分胜利的自豪，说“他们不过是娃娃，开完斗争会就叫我叔叔，搬凳子给我坐”。有一回，红卫兵要他揭发市委第一书记，爸爸说：“党内有规定，第一书记是不能反的，红卫兵就说：“那我们把你打翻在地。”爸爸笑着去说：“还要再踩上一只脚？那我也不能反啊。”爸爸那时每天的任务就是出去代表市委支持红卫兵（不论哪一派，一律打“支持”牌），与红卫兵对话，反反复复宣传我们工作中有错误，但我们是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的，

是受到中央肯定的。

但是爸爸的努力仍然保卫不了他的堡垒，因为这个堡垒最终是从内部攻破的。事发于上海一批工人造反派在安亭卧轨拦火车，企图进京。市委开紧急会，包括当时仍是书记处书记的张春桥在内，做出决议：坚决阻拦工人的行动，不能给北京造成压力，不能开工人离开生产岗位、停工闹革命的口子，这其实是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可是代表市委到安亭劝说工人的张春桥却把决议丢在了一边，命令撤除军警，放工人上北京，大叫支持工人兄弟的革命行动。接着毛泽东的最高指示传达到全国“先斩后奏好”（我只记得这一句）。于是震惊全国的“安亭事件”成了各省市工人停工闹革命的样板。爸爸一讲起这件事就咬牙切齿。作为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张春桥就是这样靠出卖市委、抢到什么突破资产阶级白色恐怖、立场鲜明的头功的。后来张春桥一伙人纠集他们信任的造反派头子成立了上海公社。这是全国第一个被毛泽东承认的“新生的政府机构”。后来，“全国山河一片红”，即自1949年成立的政权机构全面颠覆。跟着毛泽东驰骋疆场的老一代革命家成了这一轮革命的新对象。

我的父亲与无数这样的革命对象一样被没日没夜，没完没了地批斗，我完全见不到他的面，他每一天要被拉到好几个组织那里斗。听说为了要得到他们，造反组织之间干起仗来，他们成了造反派显示自己势力的棋子。有一天和爸爸一起工作过的叔叔到家里来告诉我们，他看到爸爸披着军大衣晚上就坐在一大堆看守他的工人中间在吞云吐雾的弥漫中发出鸡鸣般的哮喘。妈妈一听爸爸发哮喘了，急得不得了，赶紧找出哮喘喷雾剂等一大堆药，求那位叔叔设法送去。不久，连妈妈也被关到她所在的单位里批斗。

有一天我和姐姐被接到公安局的斗争会场，造反派要我们亲眼看着爸爸挨斗。直到今天，当我眼前出现爸爸被两个人反架胳膊出场，爸爸的头发被掀起，又被狠狠地按在地上，会场上震耳欲聋的吼声：“打倒XXX！”的场景，我的脑袋仍是一片轰鸣，我的心仍在颤抖。但是我们那天却违心地在人们呼口号的时候，举起了手臂。记得揭发的问题之一是爸爸曾赞成检察院、法院要独立于公安（这正是现在国内已经实行的）；其二是爸爸曾在一次报告中说到：地、富、反、坏分子七老八十，没有反抗能力的，要给他们摘帽子……。这一切都成了爸爸反对无产阶级专政的罪行，爸爸与已经划为中国头号资产阶级当权派、黑帮分子的上级的关系更成了他叛党的罪证。

会后造反派向我们训话，要我们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父亲划清界限。在此之后“爸爸是好人还是坏人”的问题困扰了我十年！我不相信爸爸是坏人，但如果党说爸爸是坏人，我应该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爸爸的一边？如果需要我们大义灭亲，我灭不灭？这些问题整日整夜地折磨我，我反反复复地读着毛泽东的书：“我们要站在党的立场，无产阶级的立场，人民群众的立场……”写下了无数的日记，批判自己的懦弱和舍不去的亲情。我曾经与姐姐在爸爸的卧房上贴上了毛泽东的诗句，要爸爸“而今迈步从头越”。为了表示我们与爸爸保持距离的决心，吃饭时，不给爸爸盛饭（这正象我初中的出身资本家的同学做过的），气得保姆直骂我们“没良心”。后来市革会有了专门审查爸爸的专案组，我却成了爸爸写检讨的得力助手。从红军三次反围剿，写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所有的历史和解放后担任的所有工作的表现，以及与其他人的接触。每天白日爸爸回答专案组的问题，晚上就要按照他们指示的重点问题写材料。他身体不好，以前依赖秘书惯了，我不得不帮他。实事求是地写，写着写着就变成了“自我吹捧”，或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总是通不过。爸爸要我帮他上纲上线，于是我从报上搜到了好些帽子，帮他一一戴上，真想让他早点通过，我也可结束这倒霉的差事，他又受不了，冲我发脾气。我是家里最小的，爸爸从来把我当成最不懂事的，可这回只有我陪着爸爸写检讨。我想我写的材料足有几尺高，我那写检讨的专业水平，足以开个检讨公司混饭吃，可惜现在是不会有客户了。文革十年为了千万个人的犯罪材料，中国不知砍秃了多少森林造纸，难怪北京会有沙尘暴。



1967年底，我家被赶出了市委大院。搬家那天，爸爸流泪了，他知道，无论他如何表现，如何深刻地检讨，他都被踢出了无产阶级的阵营。有两个原来的市委书记被结合到了上海革命委员会的领导班子，而爸爸再没有这个盼头。1968年2月的一天早晨六点，几个军人敲开了我们的家门，出示了空四军的证件，说是要接爸爸出去谈话。我们都想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直到八点钟专案组按常规来接爸爸，听说人已被军队带走，顿时大惊失色，我们才真的慌了。第二天专案组告诉我们，爸爸有了新的案情，他们从此不再负责爸爸的专案，妈妈让转交的眼镜已无法交给本人。妈妈的政治嗅觉使她马上明白了：爸爸一定被押到北京去了。至此爸爸度过了七年的监禁生活。妈妈虽从没在我们面前流露出半点怨怒，可她晚上却偷偷地躲在被子里流泪，头发在两年内全变白了……

~~~~~

## 【研究报告】

### 沉痛的“使命”——回顾“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

• 任国庆 •

35年前，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预告，今晚将广播“毛主席最新指示”。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虔诚地守候在收音机旁，等待着聆听“毛主席的声音”。这次广播播出了《人民日报》将于次日发表的一篇报导及其编者按。这篇报导介绍了甘肃省会宁县城关镇部份居民到农村安家落户一事，其标题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1）。《人民日报》为这篇报导所加的编者按语引述了毛泽东10多天前的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这就是“文革”时期毛泽东著名的“12·11指示”。毛的这一指示改变了整整一代城市青年和数千万城市家庭的命运。

据《人民日报》报导，从“12·11指示”发布当晚到次日，全国各大城市、中小城镇以及广大农村的革命群众和人民解放军指战员，一片欢腾，纷纷集会游行，最热烈地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当时就有人写出热情洋溢的诗歌：“北京传来大喜讯，最新指示照人心。知识青年齐响应，满怀豪情下农村。接受工农再教育，战天斗地破私心。紧跟统帅毛主席，广阔天地炼忠心。”（2）

事实上，当时许多城市青年是被政府强制离家、迁往农村的。在许多城市里，居民委员会和中学相互配合，逼迫行将毕业的中学生吊销城市户口，迁往指定的农村居住并从此以农业劳动为生。政府指定“知识青年”劳动居住的地方，通常是边疆地区或经济落后、条件较差的县。这一做法很快就成了既定政策，全国开始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这就是著名的“上山下乡”运动。它几乎涉及到全国城市里的家家户户，在农村则关联到村村寨寨。10年中全国的下乡人数多达数千万，其规模亘古未有，其影响至今难以消弥。“文革”末期，“上山下乡”运动无声无息地结束了。这场对数千万城市居民家庭的生活前途影响深远的社会性运动，就这样仓促而起，悄然而止。

如今，35年过去了，中国已经走出了那个狂躁的“文革”年代，绝大多数下乡知识青年也离开了当年生活过的乡村。对现在20、30岁的人来说，“上山下乡”似乎成了一个遥远模糊的名词。究竟为什么毛泽东和中央政府当年要发动这场“上山下乡运动”，不仅如今的青年一代一无所知，甚至当年参与“上山下乡运动”的“知识青年”也未必能说清楚。更有趣的是，如果查阅当时的各种正式文件和报纸，也同样找不到任何一种令人信服的解释。甚至在1968年12月22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报导和编者按中，主要的说法也是自相矛盾的。那

篇报导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作标题，很明显是把无业城镇劳动力到农村安家落户视为解决失业的办法；然而毛泽东的最新指示却在强调“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按照毛泽东的说法，似乎城市居民下乡落户是对他们实施思想教育的政治需要，与解决失业并关多少关系。

这场延续10年、令数千万“知识青年”及其家庭付出重大代价的“上山下乡运动”究竟出于何种目的？直至今日，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发起这次运动的原因之解释仍然莫衷一是，归结起来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的“再教育”说，另一种是“兔死狗烹”说，第三种是“经济困难”说。当此“上山下乡运动”35周年之际，笔者试就“上山下乡运动”背后的动因作初步分析，谨以此文献给参加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朋友们。

◇ 为了政治上对城市青年实行“再教育”？

毛泽东虽然提出了“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一说，但却从未明确解释过，为什么这样做“很有必要”？被毛泽东称为“知识青年”的城镇初中、高中学生们比贫下中农的平均文化程度高，毛泽东所说的“再教育”显然不是文化知识层面的，而是政治思想层面的。

在“上山下乡运动”的高潮中，人们经常引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的一段话：“我是个学生出身的人，在学校养成了一种学习习惯，在一大群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学生面前做一点劳动的事，比如自己挑行李吧，也觉得不像样子。那时，觉得世界上干净的人只有知识分子，工人农民总是比较脏的。知识分子的衣服，别人的我可以穿，以为是干净的；工人农民的衣服，我就不愿意穿，以为是脏的。革命了，同工人农民和革命军的战士在一起了，我逐渐熟悉他们，他们也逐渐熟悉了我。只有在这时，我才根本地改变了资产阶级学校所教给我的那种资产阶级的和小资产阶级的感情。这时，拿未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比较，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最干净的还是工人农民，尽管他们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还是比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干净。这就叫感情起了变化，由一个阶级变到另一个阶级。”

当时的舆论工具为鼓吹“上山下乡”而引用这段话，其实十分牵强。“知识青年”学会体力劳动，本身并不太难，这也为“上山下乡运动”中数千万“知识青年”的行动所证明；但为什么从事体力劳动就会在政治上变得“高尚”起来，毛泽东并没讲出道理来。在延安时代，出身农民、身为农民领袖的毛泽东不喜欢城市里来的知识分子，这有许多记述。当时，毛泽东可以用知识分子来自国民党统治区作理由，认定他们的思想复杂。但到了60年代末期，共产党在大陆都统治了近20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对象其实都是在中共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为什么毛泽东对共产党多年的教育成果仍然毫无信心，而要这些城市青年学生到农村去，接受并未受多少党化教育熏陶的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恐怕没有人比出身农民的毛泽东更明白，贫下中农比青年学生的思想“先进”多少，前者的灵魂比后者又“纯洁”多少。众所周知，毛泽东事实上在政治方面并不信任农民，他曾经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3）。

现在来仔细体味“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句话，会觉得毛泽东当时说“很有必要”时，好像并没有什么具充份说服力的道理，这句话似乎更象是一种颇为勉强的说词，或是一种借口。那时中央的“秀才”们千方百计地为毛泽东的说法圆场，提出了一些口号，如知识青年“同工农打成一片”、“缩小三大差别”、“改造世界观”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等。但毛泽东本人自始至终从来没讲解过，究竟“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之“必要性”何在。也因为如此，后来在诸多讨论知青问题的论述中，很少有人会认真看待毛泽东的“12·11指示”。当时毛泽东作如此说，是否有些言不由衷，或者另有隐情呢？

◇ “兔死狗烹”说：“上山下乡运动”是场阴谋？

在一些“文革”中一度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当中，这种看法有一定的普遍性。其代表作之一是贺文的“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4〕这篇文章写道：“为什么老头子送我们下乡？十分简单：‘卧榻之上，岂容他人酣睡？’党内头号走资派刘少奇已经被打倒。曾经借过力的学生组织没有用了。大学生的人数少，先抓几个坏头头，日后再整‘五一六’，便可以了结。这几千万中学生该如何处理呢？下乡！把他们送到广阔天地里去，听凭他们自生自灭，于是经过‘战火锻炼’出来的红卫兵组织便消解于无形之中也。”

最近，有关毛泽东召见北京高等院校“5大学生领袖”的谈话记录在网上披露〔5〕，据说，当年毛泽东曾坐等彻夜。于是有网友评论，毛泽东当时已感到学生是心腹大患，这成为他发动“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这类说法只是一种猜测，没有什么旁证材料。事实上，当时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人数虽多，但组织松散，且派别纷杂。毛泽东深谙权术，并不难控制这些“红卫兵”。更何况在当时全社会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狂热中，毛泽东对“红卫兵”有绝对的号召力。毛泽东1968年7月28日凌晨召见“5大学生领袖”时，为他们调解派系冲突，并批评了学生们的“武斗”活动，召见后“5大领袖”回到学校随即放下武器、拆除工事。〔6〕显然，毛泽东对高等院校的“5大学生领袖”有极高的威慑力和控制力。如果以此次接见为依据，说“红卫兵”成了毛泽东的心腹大患，为此毛发动了“上山下乡运动”这场牵涉全国千家万户的规模宏大的社会运动，恐怕缺乏依据。事实上，大学“红卫兵”中真正参加“上山下乡运动”、到农村安家落户的，只是少数人。

“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对象是中学毕业生，而中学的“红卫兵”当时最不可能威胁毛泽东的统治地位。中学“红卫兵”们组织松散、没有纲领，又年青幼稚，是没有统一行动能力的“乌合之众”。中学生充其量会因无所事事而结成流氓团伙，干扰社会治安，他们的行动破坏社会安定或许有余，要挑战当局则远非可能。其实，当时全国各大城市里“武斗”闹得最凶的并不是学生，而是工人。但毛泽东并未把参加“武斗”的工人送到农村定居以示惩罚。显然，“兔死狗烹”之说没有很强的说服力。

◇ “上山下乡运动”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

许多“上山下乡运动”和“知青问题”的研究者支持“上山下乡运动”的“经济根源说”，这一假说也为官方文件所证实。最具代表性的文件是1981年10月“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办公室”起草的“25年来知青工作的回顾与总结”。〔7〕这个文件至今似乎仍然代表着政府对这场运动的基本看法。这个文件就“上山下乡运动”的原因提出了两点说明：其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50年代根据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就业难的国情提出来的，是党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次大试验。它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其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的10年中，被当成政治运动去搞，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也损坏了上山下乡的声誉。

为了减轻当时政府对“上山下乡运动”严重不良后果的责任，这个文件声称“上山下乡”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这一说法不足为信。在“文化大革命”之前，虽然有城市居民去乡村或边疆落户，但那只是少数人的行动，并未成为全国性的强制性政策。实际上，“上山下乡”作为“运动”，就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

不过，这个文件说了一些实话，认为“上山下乡运动”想解决的“本来是一个就业问题”，但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指导思想偏了”，工作上有严重失误，造成劳民伤财，人民不满”。

此后，官方对“上山下乡运动”的评价从来没有越过这一界限。在民间，持这种观点的人也非常普遍。例如，有人指出，“知青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就业的问题。在特殊的历史时期，当经济问题无法用经济的，市场的手段来解决的时候，就演变成了一场不堪回首的政治运动。”（8）

毛泽东发表“12.11指示”时，“文化大革命”已历时两年半，在此期间，大、中、小学全部奉命停课“闹革命”。其后果是：全国各大学积压了3届毕业生等待就业；全国城乡的高中里有3届高中毕业生等待就业或升入大学，但因经济停滞、大学停止招生而无法安排；于是全国各地正在等待升入高中的3届初中毕业生也就没有出路；这又进一步造成了小学毕业生无法正常升入初中，小学校舍过度拥挤，连带着使学龄儿童无法正常入学。显然，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把整个教育系统拖入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当时正是1949年后和平年代里第一个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青年人大批进入就业期，其人数之大前所未有的。恰恰在这一时刻，“文革”使得城市工业的发展基本停顿，社会上自然就不会有新的就业机会。于是，在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形成了一个“死锁”，被这个“死锁”卡住的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初中、高中、大学的毕业生。

雪上加霜的是，1959年至1961年的3年全国性大饥荒之后出现的人口出生高峰正在60年代末转化成学龄儿童入学高峰，迫切需要整个教育系统迅速消化积压了3年的毕业生，以便腾出师资校舍，接纳新生。这就如同上下水道之间的关系：上水道来水不断，而下水道又严重堵塞，这势必造成大水泛滥。于是，在“接收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名义下，政府通过“上山下乡运动”，把几百万积压了3年的中学毕业生象“清淤”一样地从教育系统中输送到全国农村去，从而得以恢复中小学教育系统学生的正常入学和毕业，又回避了无法解决的城镇就业安排问题。

当然，在“清淤”过程中，“毛主席的红卫兵”们就只能是“文革”和党的牺牲品了。从当时中国的国情看，“文革”对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破坏如此严重，这几百万“知识青年”的命运似乎就注定如此了。问题还不止于此，完成了这3届毕业生的“清淤”之后，中小学系统虽然恢复了运转，但经济却毫无起色，城镇里仍然没有多少就业机会，于是大批中学毕业生还是只能“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就是这样从应急手段变成常规制度的。

但是，政府始终回避的一个事实是，“上山下乡”其实只是缓解了政府所面对无法安排城市中学毕业生就业的压力。而无论对“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来说，还是对接受下乡“知青”的农民来说，这个就业问题根本没有解决，它只是从政府手中转嫁给了农民。因为，在经济落后地区务农的“插队知青”不一定能养活自己，往往还要靠城市里的父母接济。如果政府把强迫“知青”到农村里苟活称为“解决就业问题”，只会挑起“知青”的怒火。对接收“知青”的农村生产队来说，“知青”的到来一般不会增加当地的农业产出，所以下乡的“知青”其实是来“分”农民的“饭”吃。正因为如此，当时许多生产队拒绝接收“知青”，即便接收了也只肯接收寥寥数人，还要求政府另给补贴。由此可见，“上山下乡运动”中安排城市“知青”到农村“插队落户”，其实质是政府强迫农民养活城市经济无法雇佣的失业城市青年，这绝不是就业问题的解决，而是把政府责任和财政负担转嫁给农民，是变相地对农民强征“知青税”。

#### ◇ “上山下乡运动”功过辩

“经济根源”说似乎触到了这次运动的实质，它指出，政府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其实是因为在“就业问题”上面临无法解决的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接收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说法，其实只不过是“在革命”的旗号下对青年的又一次愚弄而已。许多“知识青年”下乡之初，并未充份领会到这一点，但后来就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那些说法的欺骗性，进而对毛泽东时代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怀疑。“文革”之后出现的“反

思”、启蒙、改革浪潮，与“知青”一代的政治觉醒有密切关系。毛泽东完全没想到，他号召发动的“上山下乡运动”确实“再教育”了一代人，但这一“教育”的结果与他期待的正好相反，不是培养了“反修防修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而是造就了“非毛化”（用毛泽东的话语来说，也就是实行“修正主义”）的支持者，其中还包括一大批在80年代活跃于思想、学术、文化、政治各领域的“毛泽东思想”掘墓人。

现在，对“文革”10年中的“上山下乡运动”，人们大都持否定态度。有人认为，这是一场民族灾难，整整毁掉了一代人，造成了社会混乱，知识断代，科研后继乏人，“算总帐，当然是得不偿失。整整延误了一代人，其灾难性后果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份”。〔9〕也有人认为，毛泽东“是这个悲剧性运动的总导演。知青上山下乡政策的出台，并不是代表中国共产党集体的一项成熟的政策，而是较多地反映出毛泽东的个人意志及其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毛泽东的晚年失误之一”。〔10〕还有人认为：“对知青运动的评价，其中某些有血有肉的复杂层面，当然可以各人有各人的异样感受，但这是一场荒谬的、应予以否定的运动，这点难道还有什么疑问吗？……知青上山下乡如果有很多可取之处，它就不可能受到1,600万知识青年和广大老百姓的顽强抵制。10年风雨，知青的抗争从来就未曾停止过。”〔11〕

“上山下乡”的“知青”当中，大部份是到农村“插队落户”，但还有一部份虽然也是务农，过的却是“生产建设兵团”的集体生活，他们的状况与“插队知青”有很大不同。“上山下乡运动”前期，全国各地组建了许多“生产建设兵团”，有一大批“知青”到这些“生产建设兵团”参加“屯垦”。“屯垦”之制古已有之，往往是让驻军就地垦荒种田以减少军费开支。“生产建设兵团”虽有“屯垦”的功能，但却非正规军队，它同时兼具安排城市失业青年就业和备战的目的。如果从单纯安排就业的角度看，供养“生产建设兵团”成员的成本高于在城市企业里雇佣学徒工，那时一个学徒工的月工资约20元，而“兵团战士”每月的伙食费及津贴费比20元多得多，另外还有被服、房建等开支。由于成立“生产建设兵团”的军事目的远重于“疏通就业渠道”，所以当时政府为组建和维持“生产建设兵团”花费了大量资源。

1968年底，中苏关系已从“政治对立走向军事对立”。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全民皆兵”，“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备战备荒为人民”，“深挖洞、广积粮”等一系列关于备战的指示。城市里开始修建防空洞，沿海地区不少军工企业纷纷西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组建了以“知青”为主要成员的大量“生产建设兵团”。从1969年初到1970年，原有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大规模扩大建制，同时新成立了内蒙古、兰州、广州、江苏、安徽、福建、云南、浙江、山东、湖北共10个“生产建设兵团”以及西藏、江西、广西的3个农垦师，加上50年代组建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共有12个“生产建设兵团”及3个农垦师。

这里以“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为例，简单介绍“生产建设兵团”的编制。“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共有6个师39个团，1972年全“兵团”的现役军人、退伍军人和“知识青年”达17万人。〔12〕该“兵团”各师沿中蒙、中苏边境驻扎，直接受北京军区指挥，连长、指导员、副连长、副指导员以上干部均为现役军人。平时以“屯垦”务农为主要任务，但每个连均设有“武装排”，“武装排”每人配备步枪、手榴弹，排长配备冲锋枪，每个排还配备了机关枪。〔13〕然而，这些来自城市的“知青”其实并未受过正规的野战训练，武器简陋且配备不足，在军事上其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作用。

当时，“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结构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相似，但前者所辖的师、团更多，主要驻扎在东北中苏边境附近的北大荒地区。这两个“生产建设兵团”沿中苏边境线的配置，是为了一旦发生军事冲突能暂时延阻苏军的进攻。用当时的语言来说，这几十万“知青”是国防前线的一道“血肉长城”。确实，从这些“兵团战士”的军事训练基础和作战能力来

看，他们就是一道“血肉”筑成的战线，在战争状况下这些师、团的“作战”主要靠的是“兵团战士”的“革命豪情”和“一腔热血”。幸好，中苏之间没有爆发大规模战争，这是“兵团战士”们的幸运。

“上山下乡运动”的那段历史是那样痛苦，那样不堪回首，那样“值得否定”。但是，今天来回顾这场运动，是否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上山下乡”这样惨重的代价，是否会有改革开放的今天？毫无疑问，“上山下乡”的这一代人是“被愚弄”的一代。在中国特定的历史场景中，“上山下乡”似乎是这一代人无可逃避的沉重“使命”。这一代人承担了这个“使命”，为共和国走出荒诞岁月、渡过难关付出了沉痛的代价，人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

#### 【注释】

（1）“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23日。

（2）“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很有必要”，见《20世纪中国全纪录》（广州市文化传播事务所编辑，北峪文艺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929页。

（3）“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见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

（4）“毛主席为什么送我们下乡”，贺文，见 <http://archives.cnd.org/HXWK/column/History/cm9301d-3.gb.html>。

（5）毛泽东召见“五大学生领袖”。见“‘文革’时曾不可一世，五大学生‘领袖’今何在？”，人民网，<http://hi.people.com.cn/news/2003/10/29/93928.html>。

（6）出处同上。

（7）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中国检察出版社（北京），1997年，283至284页。

（8）“知青问题的经济根源”，见《大众网》，<http://www.dzwww.com/jingjidaobao/renwenchoukan/200309240589.htm>。

（9）唐龙潜，“毛泽东和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见《华夏知青网》，<http://www.hxzq.net/lishi/150.htm>。

（10）郑承军，“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评价”，见《为中华之崛起》，[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31.htm](http://www.cass.net.cn/zhuanti/y_party/yc/yc_m/yc_m_031.htm)。

（11）蓝关雪，“知青血泪30年”，见《中国报导网》，<http://members.lycos.co.uk/chinaweekly/html/ns000380.htm>。

（12）关于“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情况，参见《兵团战友网》，<http://bingtuan.com/btdsj.htm>。

（13）见《兵团战友网》，<http://bingtuan.com/jsbt.htm>。

□ 《当代中国研究》2003年第4期（总第83期）

---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加拿大）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